



发展规划动态

2016 年第 10 期

(总第 117 期)

兰州大学发展规划处编印

刊号: LKZ-16

本 期 目 录

【学校动态】

- 袁占亭：高等教育“四个回归”的时代意义.....1
- 王乘校长为机关干部做“双一流”建设专题辅导报告.....9

【政府声音】

- 高等教育要做到四个“回归”10
- 明年将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11

【专家视点】

- 依法治教：用“法”来引导、保障和丰富教育.....13
- 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与路径.....20

【他山之石】

- 争创“双一流” 香港科大带来哪些启示.....23

【学校动态】

●袁占亭：高等教育“四个回归”的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等学校期间，就党的教育方针、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养成、好老师的标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科技创新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期教育领域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他的讲话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内涵丰富，在高等教育界引发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2016年10月15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武汉地区高等学校工作座谈会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要求高等教育要做到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等四个“回归”。陈宝生部长的讲话言简意赅，是对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和基本逻辑的通俗表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系列讲话和论述的高度概括，在我国高等教育推进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回归常识是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之要

教育的常识就是读书。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视察期间告诫北大学生“大学阶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但现在读书竟然成了教育的问题，特别是成了高等学校的问题。由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一项针对国内外大学生阅读情况的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平均每天阅读文献量达到三万字以上者仅占18%，而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生是85%；我国大学生平均每学期阅读课外书达到10本书以上者仅占12%，而美、加、英、澳等国家则达92%；我国大学生平均每学期阅读专业论文达到50篇以上者仅占17%，而美、加、英、澳等国家则达89%。这些对比鲜明的数字，说明大学生阅读量不足是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现实，这和人们对大学生读书状况的日常感官感受是一致的。更令人担心的是，该项调查也发现，只有31%的我国大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要求学生写课外专业阅读文献综述或述评，而美、加、英、澳等国家则达86%；出于兴趣读书的我国大学生仅占33%，为考出好成绩而读书者高达67%，而美、加、英、澳等国家大学生出于兴趣读书者高达76%，

为考出好成绩而读书者为34%。这说明我国一些大学教师对学生读书要求不高,学生功利性读书比较普遍。我国高校阅读问题的凸显导致课堂教学改革举步维艰。

高等教育回归常识是高等学校课堂教学现代化的呼唤。教学是高等学校的工作中心,是高等学校的基本社会职能,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从恢复基本秩序到规范运行,再到冲刺世界一流,教学工作在改革中持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些高校课堂教学内容方法陈旧单一的问题依然如故,饱受诟病,已然成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拦路虎,成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的主要差距。为了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水平,推进课堂教学现代化,我国一些大学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采取了一些改革举措,例如一些大学开始开设新生研讨课,推广研究型教学模式等,但大多数改革在实践中难以为继。从学的方面来看,由于阅读量较少,大学生为教学改革课程储备的知识量有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无法实现在知识、思想、方法上的衔接、共鸣和碰撞,智力激荡不够,学生在课堂上既感受不到探索的快乐,也收获不到丰富的信息。从教的方面看,一种情况是教师知识渊博,学生知识储备太过单薄,无法进行有效互动并启发学生思维,教师只能重操旧业,以灌输、注入式教学完事;还有一种情况是教师本身知识有限,无力在现有知识基础上“以现知隐、以往知来”,无力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求知欲,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满堂灌”模式。“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于是“满堂灌”一统我国大学课堂的局面所在皆是。正如生产工具落后导致劳动者虽然辛勤付出而劳动生产率低下一样,“满堂灌”的课堂教学因教学方法落后而导致它是一种大学教师辛勤的低效劳动,这种教学无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知识并体验运用知识的具体情境;无助于训练学生的探索精神、批判精神和逻辑思维活动;无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科学精神;无助于增强师生之间思想、情感交流;无助于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动机。“在信息时代做好老师,自己所知道的必须大大超过要教给学生的范围,不仅要有胜任教学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广博的通用知识和宽阔的胸怀视野。”因此,深化教学改革就必须

革除陈旧落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而这又必须建立在教师和学生回归常识，即读书的基础上。因此读书成为深化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控制之要。

高等教育回归常识是提升大学品质的需要。优秀的大学因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先进的文化引领、超凡的时空连接而让人流连忘返；优秀大学的师生因其执着的科学精神、流淌的人文情怀、优雅的行为举止、深邃的思想意境、高尚的审美格调而让人肃然起敬。具有如此氛围和如此气质的大学才是高品质的大学。高品质的大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其核心成员矢志追求的结晶，或者说是大学师生读书读出来的、是从书中悟出来的。读书特别要读包括马列经典在内的中外经典名著，这是因为经典凝聚着人类的思想精华，珍藏着人类的智力成果，阅读这些精华不仅能给人带来巨大的思想共鸣和感官享受，而且还能训练和发展人的智力。经典回答人的意义，探寻社会之美丑，发现自然之规律，阅读经典能升华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审美格调，浇灌人的理智之花。永恒主义教育思想家赫钦斯和阿德勒就非常推崇经典名著的教育价值，认为名著超越了地域和时间限制，具有永恒价值。

在当代中国大学，我们读书还要注意读在书中，悟在书外，思想要能在书中书外跳跃，读的是书中文字，想的是国家和人民，“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理论联系实际，不要死读书，读死书。

回归本分是高等教育基本运行规律的不易之典

教书育人是教育分内的事，是高等教育不言自明的本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说“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教书育人这四个字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人类教育的永恒追求和高等教育的基本运行规律。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促进人发展是教育的两大基本规律之一。从教必育人，育人必从教，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德国著名教育思想家赫尔巴特就非常重视教书和育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我想不

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就是这样一条普世性教育准则,在我国高校却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瑕疵。“少数高校教师理想信念模糊,育人意识淡薄,教学敷衍,学风浮躁,甚至学术不端,言行失范、道德败坏等,严重损害了高校教师的社会形象和职业声誉。”所以,高等教育回归本分刻不容缓。

高等教育回归本分仰赖于一支学问德行兼优的教师队伍。如果说大学是知识的圣殿,大学教师则是圣殿中的布道师。大学教师既作为知性而存在,又作为德性而存在,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担当教书育人的责任。当然,尽管学问和道德在大学教师身上不可偏废,但要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大学教师首先应该以知性的方式而存在,以知识权威的角色存在,这是他们赖以存在、证实自己的最根本理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以知性方式和知识权威存在的大学教师,容易赢得社会和大学生的敬仰,这是因为知识在其发生学上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大学教师的事业是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大学教师凭借知识和对知识的传播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很难想象一个知识贫乏、专业水平很低的大学教师会赢得社会和大学生的敬仰,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学教师能够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但大学教师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们还具有教育者的身份和角色,所以,大学教师除了以知性而存在外,还要以德性而存在,这是由教师劳动的特点和社会价值决定的。大学教师劳动的对象是处于成长中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而有相对独立性的大学生,大学生又具有乐于接受教师教导的“向师性”特点,对教师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和依赖之情,教师在他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威信,大学教师对学生来说就是一部经典,教师的一言一行、道德风貌、行为习惯、个性特征等都会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大学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递人,联系着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学

教师的劳动也关系大学生的发展和幸福,社会越发达、科技越发达、社会冲突越尖锐、价值取向越多样,社会就越需要大学教师的指导,大学教师的劳动就越有社会价值。这就决定了大学教师以知性而存在之外,必须以德性而存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时时处处用自己的积极行为去影响学生的行为,用自己的良好个性去影响学生的个性,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德性不是以话语方式而存在,而是以一种实践人格方式而存在的,道德永远是一种实践伦理,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对象,“好老师应该懂得,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细微的教学管理之中。”大学教师如果要真正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就需要以集体或个体的生动道德实践给大学生提供人格表率,这是真正的道德源泉。

高等教育回归本分要求大学教学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科学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统一。以语言符号系统存在的知识,不仅具有认知价值、能力价值和实践价值,而且还有陶冶价值。知识具有陶冶人生智慧的价值。知识蕴涵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学生经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陶冶,体验到以史为据的事实尺度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感悟到人何以生存,为何生存,才能真正形成人生智慧,具有人生理想,人生抱负,担当起社会责任,人类责任,才能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才能成为挣脱奴性、物性的大写的人。”但知识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是学生可以自动发现的,而必须在教师的传道、解惑和启发中才能被发现。“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大学教师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时,要注意使传授的知识能给学生以强烈的思想影响,不仅要使学生深刻领悟知识,而且要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引发他们思想情感深处的共鸣、惊讶、敬慕和激奋,形成强烈的爱憎感、荣辱感。大学教师要防止在教学中脱离知识教学,空泛地进行道德说教,这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所以,一定要做到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科学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教学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回归初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点题之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向全党发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动员令,告诫全党“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国初期就厘定了自己的教育方针。建国以来,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在文字上有不同的表述,但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没有改变,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教育初心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就说:“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党和人民需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好老师的理想信念应该以这一要求为基准。”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绝不能忘记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

高等教育回归初心就是要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大学毕业生。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并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使人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整体性。人发展的整体性规律要求教育把学生看作复杂的整体,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等几方面全面和谐地发展,把学生培养成完整和完善的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初心,同时也是人类教育的理想。从苏格拉底的全面和谐教育到第斯多惠的“全人类”教育,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的“新人”教育目标到英国的绅士教育和瑞士的要素教育思想,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展现的未来社会理想教育模式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无不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初心和人类教育理想是一致的。

高等教育回归初心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所培养人的社会价值,即为谁培养人。对此,党的教育方针已经作出明确界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体到高等学校,就是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体现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教育固然要追求个体素质和个性的发展完善,这是教育目的的核心,但教育目的也是有社会制

约性的,教育目的不是超社会、超历史的。我们切勿只顾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否则可能会培养出有才无德的“危险品”。

回归梦想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教育梦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教育梦和中国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一百多年来,面对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祖国,一些中华民族的社会精英怀抱教育救国的梦想,把自己的强国梦寄托在教育梦想的实现上。今天,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已经居于世界中上行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教育强国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早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而且有望在2019年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我国高校高端人才和创新内生力不够,对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和创新引领不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任极具挑战性,回归高等教育梦想的使命光荣而艰巨。

回归高等教育梦想就是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学科。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创造财富的模式已经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和思想成为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关键要素。在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中,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培养高端创新人才、创造发现知识和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性成就。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创办的4000多家公司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创造的收入可以使他们跻身于第24个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这些公司的年收入达到2300亿美元,雇佣了100多万员工。硅谷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斯坦福大学。很多当今世界上IT(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头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它们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MIPS和SGI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Webex等。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目前

世界百强大学每年校均发表的 SCIE&SSCI;所收录的论文在 4200 篇以上,远远超过一般研究型大学。世界百强大学每五年在全球顶尖期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上发表近 60 篇论文,占大学发表总数的 3/4;世界百强大学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占到大学获奖总数的 94%。世界一流大学在原创性研究上具有绝对优势。基于知识资本的强大力量,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学科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无不为之竭智尽力。目前全世界有 30 多个国家在实施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共涉及约 2000 多个学校或机构。著名的有日本的“全球顶尖大学项目”、韩国的“BK21 PLUS”计划、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俄罗斯的“5—100 计划”、法国的“卓越大学计划”、澳大利亚的“G8 联盟”、印度“卓越潜力大学”计划和“创新大学”计划等,甚至连越南也要在 2020 年前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建设计划中的大多数竟然来源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启发。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实际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激烈竞争的态势,中国当不遗余力、砥砺前行。

回归高等教育梦想还应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应用型大学和职业学院。一流大学是个建设性概念,由于条件所限,一流大学建设只能是小范围的,涉及一小部分办学基础较好的大学,待条件具备,范围会逐步扩大。同时,一流大学也是一个精神性概念,争创一流、追求卓越意识和精神,应该是所有大学都必须具备的。和二十年前相比,我国经济实力有大幅度增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连续 4 年达到或超过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 4%,现在我国已经具备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应用型大学乃至高等职业学院的财力基础,应不失时机地将建设基础比较好、人才培养质量被社会高度认可的若干应用型大学乃至高等职业学院纳入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一流大学不都是综合性的,也不都是研究型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建成世界一流。真正的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结构优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既不是少数高校的单兵突进,也不是若干高等教育机构简单相加和杂乱堆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很强的整合功能。优良的高等教育结构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科类、不同能级、不同规模组成的一个分工合作、

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 $1+1>2$ 的整体效应。只有建设一个结构优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我国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强国。

回归高等教育梦想还应走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之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中国大地上的大学要有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一份特殊担当、特殊使命和特殊情感,想国家之所想,做社会之所需,要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振兴、人民幸福的有机统一;实现科学精神、人文情怀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实现批判精神与建设精神的有机统一。(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16-12-06)

●王乘校长为机关干部做“双一流”建设专题辅导报告

根据学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安排部署,10月27日,学校机关党委邀请王乘校长为机关干部做“双一流”建设专题辅导报告。校党委副书记郭琦、曹爱辉,副校长曹红和机关300余名管理干部听取了报告。报告会由机关党委书记刘同昌主持。

报告中,王乘以《立足岗位讲奉献、推动发展有作为》为题,在全面介绍国家“双一流”建设内涵与建设方式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我校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经过“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我校的整体实力明显增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明显缩小,已经具备了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但是,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制度和学术环境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差距。

王乘指出,自2015年5月我校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工作以来,各建设

项目正在规范、有序推进。下一步,学校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和“大钱大用”的建设原则,在保持现有学科优势的前提下,以建设一流队伍、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为导向,以人事改革为重点,采取引进及培养学科学术带头人、校内学术队伍重组等方式,进一步凝练学科特色、优化学科结构,整合汇聚优质资源,全面提升学科整体水平。同时,参照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框架,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强特色学科群和优势学科群的建设。

王乘表示,开展“双一流”建设必须始终把握“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把服务国家战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出发点。机关干部要进一步提升“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意识,把我们开展的工作与地方发展对应起来,发挥联结地方发展需要和学校智力、人才优势的信息桥梁作用,积极引导学院和师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王乘强调,全体机关干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学习“讲奉献 有作为”专题,就是要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学校当前全力推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好枢纽作用,以高度的政治意识、自觉的大局意识、前瞻的创新意识,细致入微地服务好广大师生,以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为兰州大学走向新百年的辉煌做出更大贡献。

“校长的报告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双一流’建设的全景图,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知道了学校未来的发展走向,也进一步明晰了在日常工作中支撑‘双一流’建设的责任和着力点。”在听取王乘校长的辅导报告后,机关干部表示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中建功立业,再创辉煌。(摘自:兰州大学新闻网 2016-10-28)

【政府声音】

●高等教育要做到四个“回归”

教育部10月1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武汉高等学校工作座谈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湖北省教育部门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7所在汉

高校负责同志先后发言,汇报了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情况。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陈宝生表示,湖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重镇,高校众多、历史悠久,在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充分肯定了各高校在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双一流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工作进展,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种良好势头,更加注重以理性和科学的精神扎实工作,推动高等教育朝着建设教育强国的方向持续健康发展。

陈宝生强调,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做到四个“回归”。一是回归常识。教育的常识就是读书。要围绕读书来办教育,积极引导广大师生读“国情”书、“基层”书、“群众”书,读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列经典、中外传世经典和专业经典,杜绝浮躁、理性思考。二是回归本分。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书育人。教是手段、育是目的;教是过程,育是结果。做教育分内的事,就是要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三是回归初心。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一要成人,二要成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大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要坚持育人育才的初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四是回归梦想。教育梦就是报国梦、强国梦,具体体现就是“双一流”建设。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就是要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创造性传承中华文明,创新性建设中华文明,最终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陈宝生还调研了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工作,并参观了“信息化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展”。(摘自:《中国教育报》2016-10-17)

●明年将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

明年,我国将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今天在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透露,教育部将于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颁布实施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

当前,人才培养被高校摆在更加重要突出的位置。林蕙青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再次明确,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

她介绍,最近一批高校在制订“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时,把建设一流本科作为核心指标,把教育教学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一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正在扭转,一些高校的科研优势正在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而高校新一轮综合改革方案普遍将教师评聘奖励制度改革作为重点,重中之重是增加教学权重、引导鼓励教师把精力更多地投入教书育人。此外,人才培养经费持续增加,31个省(区、市)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全部达到1.2万元。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增强,一批高校形成了人才培养工作自我诊断、自我完善工作机制。

但是,林蕙青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就全局来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还不够牢固,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教师投入、资源保障还没完全到位,人才培养工作仍在爬坡过程中。

林蕙青表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教师、学生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责任,各方都要担负起各自的使命和责任。

她以高校为例指出,高校要进一步落实人才培养核心地位。比如,当前重要的是,高校要避免将“重视教学”“重视人才培养”泛化、抽象化。学生和老师不是符号和数字,高校要深入、具体的推进人才培养工作。此外,高校也应该对院系和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大对学生实习的投入。

林蕙青介绍,为了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教育部制订和修订基础性教学文件,还实施一系列教改专项,推动教学改革。比如,实施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专项,国家投入资金支持若干国家发展战略急需的重点领域,推进教学改革。

同时,教育部也在积极推动教学质量评价监督:要求高校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自评体系;开展对高校教学质量的审核评估;对高水平大学的工程、医学等职业性强的专业,开展专业认证,确立国际标准;支持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多种形式

的学校教育教学评价。比如,去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的“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评选活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每年开展的学生对学校教学工作满意度调查等。(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10-30)

【专家视点】

●依法治教:用“法”来引导、保障和丰富教育

11月5日至6日,由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指导,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教育法学研究会协办的首届“中国教育法治与教育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

出席嘉宾: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马怀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袁振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胡建淼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劳凯声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叶必丰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孙霄兵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随着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也呈现了新的特点,人们对教育权益保障的追求更加强烈,对教育公平的诉求更加迫切,依法维权的意识也日益高涨,教育面临的司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深入推进教育法治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日前举办的由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指导,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教育法学研究会协办的首届“中国教育法治与教育发展高峰论坛”上,专家们各抒己见,共同关注依法治教。

1. 决策科学化是依法治教的基础

袁振国:通常讲政策,是指政府部门的行政决定。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多

个行政部门特别是综合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到具有较高自主权的学校,有四五个层级,有的时候还要更多一些。各个层级的权责的边界在理论上是否明确,在实践中是否遵守落实?在什么层次谁有决策权?上级干预下级、行政干预学校的内容、程度有没有限定,程序是什么?责、权、利如何统一?这都需要不断明确。

不同层级制定怎样的政策,不同层级政府针对同一个工作内容制定政策的时候在原则性上、针对性上、具体化程度上无疑应该层次分明。

政策从宏观到微观,从上位到下位,是一个完整的政策系统,各级各类的教育政策,中央的、地方的和教育其他行政部门的政策应该相互衔接、各司其职。

马怀德:教育决策权是教育主管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行使的重要权力,关系到受教育者和师生的重大利益和权利。当前,教育领域还存在不重视决策程序,随意决策、决策不负责任等问题,必须有效加以规范。

袁振国:要保障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必须要有透明的程序,程序越透明,就越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政策的制定过程并不是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更不是每人一票。民主化更应注重利益相关者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保证是信息公开,参与决策人的意见和理由要向社会公开,所有参与决策的人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马怀德:我认为,实现重大教育领域决策法治化,应当坚持以下制度和程序:

一是合法性审查制度。教育主管机关和各类学校在作出事关社会公众和师生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必须履行决策的合法性审查程序,在决策前由法制机构或者法律顾问先行合法性审查,凡不能通过合法性审查的决策不得上会讨论,不得作出决策。

二是专家论证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的专家论证制度和听取意见制度,直接关系到教育领域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教育领域的很多决策涉及专业技术问题,必须在决策前交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家咨询论证,凡未能通过论证的亦不得作出决策,唯有如此,才能防止领导随意决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云集,有助于教育主管机关和学校落实专家论证制度。特别是高校,可以通过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校内学术机构实施专家论证咨询,提高高校决

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是集体决策制度。教育领域的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经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和学校领导班子的集体讨论决定,以规范依法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校,确保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四是风险评估制度。一个重大政策的制定,是关乎国家利益、百姓幸福的大事,所以建立事先的包括社会稳定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在内的风险评估制度很有必要。增加风险评估的政府决策过程,实际上夯实了教育决策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实现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效服务社会等多重效果。

五是决策公开制度。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高校信息公开清单50项多数涉及高校的决策事项,连同教育主管机关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需要公开的各类事项,构成了教育决策公开制度的主要部分。在此基础上,要建立健全教育决策公开工作机制,规范重大事项决策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法。决策通过的重大事项,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政务网上全面公开,并以书面形式告知有关方面。

袁振国:对政策实施的情况进行评估也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及时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可以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经验,可以对政策的内容及时进行修改、补充或停止,尤其是事关全局、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策及时获得政策效果的反馈意义重大。

马怀德:完善教育领域的决策制度,各级教育主管机关和学校领导干部要更新理念,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决策权,确保教育领域的决策民主、科学、规范;要完善相关配套法规规章,理顺行政教育领域体制、细化各项教育领域决策制度,增强决策制度的操作性,提升教育领域依法决策的水平;要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制度,将重大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范围;要严肃追究违法违规决策的法律责任,实现教育领域重大决策法治化目标。

2. 依法治校就是要处处体现法治理念

胡建淼:自从200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推进“依法治校”已有十几年,但是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不少高校没

有真正重视,更不要说真正做到“依法治校”。

要推进依法治校,首先认识上必须到位。抓“依法治校”不是为了“宣传”,不是走形式,而是为了提高大学的治理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落实这两项任务,大学就要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推进“大学治理法治化”,而推进“大学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又在于深入推进“依法治校”。

有些高校领导重视学科和大学排行榜,但不够重视依法治校。有些学校的主要领导,在落实依法治校时,应付性地做一些表面文章,但内心是不重视的,甚至认为抓依法治校是“添乱”。有的高校拥有一流的学科,但只有三流的管理。为此我想说:如果你有一流的学科,但只有三流的管理,那么你的学科迟早会降至二流;相反,你虽然只有三流的学科,但有一流的管理,那么你的学科建设水平也迟早会上升。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是个系统工程,但无可置疑的是,“依法治校”是提高学校管理的重要“抓手”。所以说,抓“依法治校”就在间接地抓学科建设。

大学要“去行政化”是一个正确的高校治理改革方向。但大家一谈“去行政化”,就容易集中到大学“去行政级别化”。我以为,这抓错了重点。大学治理“去行政化”,首先指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要“去行政化”,政府不能把大学当成“行政机关”,否则会将大学管死;其次是在学校本身的管理中,要坚持学术权与行政权分离,并坚持学术权高于行政权。

孙霄兵:当前,教育部推动落实和下放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同时推进大学章程建设,通过完善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构建高等学校依法自我管理的治理体系,就是深刻体现法治思维的改革举措。

胡建淼:“依法治校”不仅仅是依“法律”条文治校,更是让法治精神渗透到高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学校管理是否真的需要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校”是否真能提升学校的管理水平?这与我们是否正确理解“依法治校”有很大关系。有人以为,我们学校既不是行政机关(需要执法),也不是人民法院(需要判案),

“法”与学校离得太远。这还是反映了我们没有真正地、正确地理解“依法治校”。要正确而全面地理解“依法治校”，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依法治校”不是“依罚治校”；第二，“依法治校”主要是治“治校者”，不是仅仅针对“被治校者”；第三，“依法治校”主要不是指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将“法治精神”渗透和贯彻到学校的管理制度中去，使得整个学校的管理符合“法治精神”。

孙霄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要求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开展法育，培养青少年基于法律的国家认同、制度认同、道路认同和社会共识，培养青少年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要把法育的理念贯穿教育全过程，成为培养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和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一样，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维度，成为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基本遵循。

3. 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劳凯声：落实依法治教，需要涉及厘清各类关系，其中关于公立学校在司法上的定位是我想提出的问题之一。

在我国，公立学校在很长时期里被定位于由政府举办、不具备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对公立学校的这一定位带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的一种传统认识。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开始分化出公域和私域这样两个不同的社会部门，对公立学校重新进行定位的问题开始凸显。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了公立学校的法人制度，这是对公立学校的一种新的法律定位。公立学校法人制度使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分权获得了合法的依据，并使公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一界定较为笼统、性质较为模糊的学校权利获得了合法性。但许多人认为，由于我国的学校法人制度尚无公法人、私法人之分，因此法律并未对公立学校法人进行明确的性质规定，公立学校

的法律地位还存在模糊空间。

由于我国法人制度包括了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教育机构,这意味着获得法人资格的公立学校要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不同学校在责任能力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对于某些类型的公立学校,例如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以及相当一部分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学校教育机构而言,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公立中小学而言则不同,这类教育机构承担着基础教育方面的国家责任,体现着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都与其他类型的学校教育机构有着极大的区别。特别是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按现行法律的规定,为了体现教育的公益性质,其办学经费全部或基本来源于国家的公共财政拨款,并无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但《教育法》却忽视了义务教育学校的这种特殊性,把义务教育学校等同于其他类型学校,作了一个笼统的规定,未能根据实际条件的不同对不同学校作出必要的区分,从而产生了义务教育学校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之间的扭曲。以近年来发生在中小学校的学生伤害事故为例,学校无奈,家长埋怨。而社会又普遍同情处于弱势的受伤学生,法院判决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学生伤害事故问题成了一个十分敏感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孙霄兵:法律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要把改革要求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比如,目前正在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分类管理,为下一步民办教育改革打开新的空间、提供法治保障。要通过法治方式化解风险和矛盾。当前的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教育领域新的矛盾和热点不断涌现、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增多。目前较为突出的学校安全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方式进行破解。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立健全学校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的意见并积极推动学校安全立法,明确各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边界。要推进管办评分离,改变传统行政的管办不分、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更多通过行政执法等方式实施教育管理。

劳凯声: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状况、从社会对教育的功能要求,以及其发挥的实际可能性看,可以这样来概括我国公立学校的基本特征:公立学校是由国

家设立、为不特定多数人服务、以培养人才、创新和保存知识为目的、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功能性社会组织。从机构性质看,应是一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从社会功能看,应是国家以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开展学术研究为目的而举办的、由公共财政经费维持的社会组织。从其与政府关系看,是具有独立管理机构的组织体,而不是行政机关的内部单位和附属机构。从法律地位看,作为独立办学的法人机构,公立学校的办学权利是一种复合型权利,其中既有通过政府的公务分权获得的公权力,也有作为独立法人所具有的法人权利。公立学校作为法人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不应当损害公立学校的公益性质。因此,公立学校法人在法律上似应单独列为一类特殊的法人类型,可称为“公立学校法人”。

叶必丰:我认为,还有必要厘清司法判例对高等院校行政职能的影响。

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并非国家行政职能,而是一种民主性治理、自主性治理。自主性治理所引发的纠纷,基于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性,不能直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也不见得要通过行政诉讼来化解,至少不应该把高校认定为国家行政机关,直接由法院来审理。该类纠纷也不合适通过向教育主管们申诉,然后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否则,会导致纠纷的滚雪球效应。

比如1999年4月田永案的判决认为,《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都是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明确法律依据。

上述判决并没有追问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是内部自治性的行政管理还是对社会的国家行政管理;没有探寻《学位条例》所称“授权”,是否就是晚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上的授权;没有甄别《教育法》所称高校的“权利”,是否就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没有权衡对学生管理与对教职工管理的一致性。上述判决更没有着眼于未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高校自主权,仅仅立足于此类管理纠纷如果不由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那么应该由谁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

田永案基于媒体的传播,各地法院竞相效仿;基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刊载而取得了指导地位;基于2014年入选指导性案例,使得“各

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退回到自己的界限范围内，社会的回归社会。为此，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实行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具体规定：“对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

高校作为事业单位，理所当然应按照上述文件要求进行政事分开改革。高校即使具有行政职能，也必须予以剥离。以往司法判例影响下的行政职能变化，必须正本清源。

我们需要创新高校办学自主权纠纷的化解机制，可以建立类似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的纠纷化解机制。每个省级行政区设立一个仲裁委员会，由高校推荐的人员、学生推选的人员和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人员组成。仲裁以调解为前置程序，以诉讼为终局程序；诉讼不能以仲裁组织为被告，而只能以原纠纷双方当事人作为原被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要求，体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摘自：《光明日报》2016-11-08）

●西南交大学者：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与路径

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征程中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该如何抉择？历史与现实地看，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学有着各具特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方略，但彼此有着共同的理路，即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取胜、集群发展、协同发展。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特色发展模式。强化学科建设特色，在学科定位、学科方向的选择与聚焦、建设资源的集中等方面，强调特色和重点，坚持扶优扶强，重点突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曾说，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但是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以创造“硅谷”财富神话而闻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只有短短 100 多年的历史，何以

比肩已有 300 多年历史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缘于其在学科发展模式上选择了重点突破的特色发展模式。“二战”后的斯坦福大学作为一所私立二流院校,地理位置偏僻,师资流失严重,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极为困难。面对这一困局,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特曼大胆地提出了“学术顶尖”的构想,决定采取特殊措施,重点发展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学科,经过重点建设,三个学科尤其是物理和电子工程学科成绩斐然。1952 年,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标志着斯坦福大学进入一流大学的行列。在电子工程学科领域,特曼依靠出租学校的土地,建立高科技工业园,不仅使该地区成为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集散地(被人们称为“硅谷”),而且还极大地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吸引了人才,为电子工程学教学、科研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科与“硅谷”一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水平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一个样板。

二是集群发展模式。集群发展是指注重学科交叉,在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学科群,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大而全”。当今科技发展不仅需要同一门类的学科之间打破壁垒和障碍,进行交流与合作,而且需要不同门类的学科进行跨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呈现集成化的趋势。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间相互渗透,理科与工科、农医等不同门类间相互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相互交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方向、新技术与工艺以及新的理论体系,催生新的学科。闻名世界的私立大学、享有“小联合国”美誉的芝加哥大学选择了综合集群发展模式,囊括了人类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物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神学等学科专业。自建校伊始,芝加哥大学始终坚持兼收并蓄,秉承全面发展的理念,朝着哈珀校长的理想目标——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

三是均衡发展模式。普林斯顿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既坚持少而精,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科间的均衡发展。不同于美国其他一流大学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不仅规模较小(在校生规模不过 7000 余人),学科也不齐全(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但这却并不妨碍甚至可能还促进了它的龙头地位。另外,普林斯顿大学非常注重保持各系科之间的有机联系,从学科专业的设置,研究内容和方向的厘

定到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制定,绝不游离于整体之外,巧妙地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保持整体的平衡,维持学科发展的生态。因此,即使是一些特别热门的科研项目,社会需求量大,资金充裕,学校也不允许其无限制地发展。而对那些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滞后,较少或基本不能获得外界经费资助的学科专业,学校却进行最大限度的扶持。

四是协同发展模式。享誉海外的麻省理工学院(即“MIT”)被誉为“全球理工科大学之最”。然而MIT始终坚持理工与人文交叉、协同发展。MIT并不只有强大的理工科,而且有雄冠天下的经济学科。它不仅拥有享誉世界的工程分院、自然科学分院和管理分院,在宇宙科学、原子科学、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具有独特的领先优势和特色;还通过学科交叉、协同,充分发挥理工科对人文学科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培植与工程、科学直接相关的学科”,形成了“语言学与心理学携手并进,经济学与工业管理学紧密结合,政治学和电子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发展态势,建成了一流的建筑与规划分院、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院。特殊的发展模式,造就了MIT与众不同的人文学科内涵,成就了其人文学科不输于其他学校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正是通过文理交叉、相互渗透、协同发展,才使得MIT的理工类学科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行业特色大学可学习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科组织模式。美国大学科层组织与矩阵结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表现为:一方面继续保持按学科分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院系科层式学科建制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组织,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如MIT除设有建筑和城市规划分院等6个学院外,还设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等44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英国大学小而全的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表现为:坚持学校中央架构与独立的学院架构并存,其学科建设注重并强调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发展。牛津、剑桥等大学虽实行学院制,但鼓励文理交叉。独特的学院制体制以及学科的混合为师生提供了跨学科合作研究及与其他部门加强学术联系和合作的机会。日本大学的学群、学系制,使不同学科领域的教育、研究得以交流与协作。面向工业的“研究所”模式有利于解决综合领域

的问题,在学科的划分上体现了学科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发展规律。“研究中心”模式则在“研究所”模式的基础上更加体现出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

(摘自: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11-3 作者: 程孝良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他山之石】

●争创“双一流” 香港科大带来哪些启示

办学理念和内部管理对于许多高校来讲,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让二级机构(学院)成为学校的办学主体,这是未来争创双一流大学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牵涉到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改变问题,难度和压力都很大,这需要学校的管理机构放权。社会要还权于大学,大学要还权于学术,教育要还权于学生。

已经先后六次被评为全球第一的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是大学高等教育的领跑者。那么,它对我们有哪些启迪和借鉴呢?24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关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新角色”的研讨会上,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谭嘉因院长和徐岩副院长接受了科技日报的采访。

“Can do” “敢做”

“Can do”是科大的精神,翻译成中文就是敢做。这种办学理念下,创新的文化就会得到释放。

谭嘉因院长认为,一个创新的文化就是不要怕失败,只要你的用心是好的,失败是正常的,不可能什么都成功,这一点是科大不同的地方,Can do,什么东西都敢做。“而且我们可以没有许多条条框框,不需要这个审批那个审批。我们给很多机会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只要有一个 idea,我们会给予鼓励,鼓励他们尝试,允许失败。”他说。

得益于香港有这样的一个宽松的环境,政府一般不干预,一些自负盈亏的课程,大学自己来做。因为关系到你学院的学术声誉的问题,政府会信任你,有损声誉的事儿大学不会做的,政府不会来干预你这个行那个不行,政府也不懂哪个好,哪个不好。“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我们就敢于尝试,敢于创新。”徐岩副院

长说。

徐岩当商学院副院长已经好多年了,他们每次讨论要不要开一个新课程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要经过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讨论。基本上有人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大家事后讨论一下就开始做了。很多课程的设置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很少有这样宽松的氛围,人们看到的普遍现象是,一点小事都要经过几级政府的审批。因此,大学教育改革需要社会要还权于大学,大学要还权于学术,教育要还权于学生。

大学还权于学术的核心在于二级机构(学院)要成为学校的办学主体。比如,学院要承担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聘请教师由学院决定,因为学院对于学科的了解更深入。教育还权于学生是要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学生,把真正学习的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而这些都需要制度的保证。

多元化与国际化

据谭嘉因院长介绍,香港科大商学院有12所研究发展中心。卓越的研究实力不但备受全球学术界肯定,同时亦为区内市场注入新思维。学院共有12门本科主修科,共逾3000名本科学员,来自35个国家。本科课程与超过120间伙伴学校合作,网络跨越全球27个国家,为学员提供海外学习机会,汲取亚洲营商知识,扩阔环球商业视野。

“因为我们讲课是用英文,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全世界找的,讲课用英文来讲。”谭嘉因院长说。他强调的是科大商学院汇聚了全球顶尖学者,拥有逾140位教授,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种族背景,为学员创造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发挥多元创新思维。

徐岩副院长特别提到了学院的一个本科班。这个班的学生学习四年,其中一年在香港,一年在意大利,一年在美国,最后一年随便选。“这样的话,这个学生四年期间,到了三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他出来以后国际化视野非常非常开阔,这科是我们第一个自负盈亏的本科课程,类似的课程我们有很多。”他说。

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化还表现在聘请教授上。徐岩说:“我们都是全球搜索,一定找最好的教授过来,给我们学生上课。所以现在的课程很受同学们欢迎,他

享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资源。但是正因为香港科大是亚洲的第一平台，你去请那些世界级教授，他才愿意来，你是三流的学校他过来会觉得很难堪。我是来挣钱的吗？科大请他，觉得是一个荣耀。”

同时，他还认为，商学院不应当只是一个传播知识的地方，还应当是一个制造知识的地方，所以科大一直对研究非常的在意。“上 MBA 的 EMBA 也要看，有许多教授在全球最顶尖的杂志里面发表过论述，这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科大商学院很强调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国际化体现在我们的学生从不同的国家来，我们的学生男女比例协调，强调多元化。”他说。

传授的是创新思路

徐岩院长认为，创新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什么专门的创新。比如大数据，它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过去数据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大家看不到它的价值，现在数据量到了一定程度，演算方法也变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所以，我在讲创新的时候，我更多的是讲一些关键方面的思路和管理上的新方法、新思维、新概念。比如说，我讲的一个重点课程。其中，重要的一个模块是讲开放型创新，现在的企业或者一个机构，包括一个大学也一样，不能只靠内部的资源，现在在互联网时代下，全球的资源都可以被你利用。”

徐岩院长的创新课有一个经典的例子，被列入顶级大学——伯克利商学院的案例课，说的是华为的开放性的创新框架。华为自己有 7 万多名研究人员，但是做电子通信方面的全球的教授学者加起来可能 700 万都不止。所以，华为现在就是跟全球的差不多 30 个国家、200 多所大学的最顶尖的教授来合作，包括有两位是诺贝尔获奖者。这样做的结果是，华为要解决什么问题，全球的教授都在为他们服务，这就是一个开放型创新的模式。“这种思路可以用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包括我们现在的大学课程，我也是一种开放性思维的方法。”徐岩说。

谭嘉因院长认为，香港科大商学院的另一个创新是，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 MBA 班里有一个聚集点，就是学生读完 MBA 三年之后，在工作的时候可以人均拿多少工资。这是评比香港科大商学院实力的重要因素，是商学院的一个增值。

（摘自：中国科技网 2016-10-26）

主 编：吴国军

副 主 编：武建龙 罗 云

编 辑：辛 颖 尚 胜 辛江龙 郭 芮 张菡笑

本期责编：张菡笑

兰州大学发展规划处

地 址：贵勤楼 223 室

电 话：8914093

邮 箱：fgc@lzu.edu.cn

网 址：<http://fgc.lzu.edu.cn>

本期刊印时间：2016 年 12 月 日